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24) 01 - 0105 - 08

# 调查研究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的初步运用

## ——以驻外使馆为中心的考察

■ 燕 美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经济建设任务,我们党高度重视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驻外使馆作为我国驻建交国家的前沿“观察站”,在搜集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由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也就成为新中国获取国际信息的重要途径。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内容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派驻初期,多以礼宾工作及事务性工作为主,随着驻外使馆工作的不断推进,调查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展到研究了解驻在国内部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上来。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大多以书报材料研究、会谈与问询、实地参观等为主要途径展开,形成了一批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成果,对驻外使馆外交工作经验的积累、新中国外交决策的制定、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外交工作;调查研究;驻外使馆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新中国外交工作也不例外。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我国驻外使馆是国家派驻建交国的外交代表机关,是处理与建交国家双边关系的前沿机构。调查研究作为其基本业务之一,是了解驻在国国情及国际形势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发展双边关系、推动新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驻外使馆对建交国家的调查研究实践为主要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等多重资料,厘清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调查研究的探索与起步过程,进而分析其历史意义。

### 一、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经济建设任务,我们党推动我国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是有深刻考虑的。

(一)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外交工作中,党对调查研究同样给予高度重视。从中共中央选派的首批驻外大使来看,其中多数是从解放军部队征调来的干部。<sup>[1]</sup>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军队干部政治立场坚定,而且在于其十分熟悉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1950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袁仲贤、耿飏、王幼平等大使时指出:“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

[1] 1949 年 10 月,王稼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1950 年 4 月至 9 月,袁仲贤、耿飏、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铨、姬鹏飞,被中央人民政府分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瑞典、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匈牙利、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1951 年 5 月,韩念龙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当时虽未实行军衔制,但因该队伍多数成员为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故后多被称作“将军大使”。

展调查研究”，并强调“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sup>[1]</sup>周恩来也指出，“打仗前参谋长要对敌情、民情和战场的地形、环境等进行周密的调研，做外交工作也同打仗一样，要了解驻在国的风土人情和各种情况，才能做好工作”<sup>[2]</sup>；“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sup>[3]</sup>。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同样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使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业务之一”<sup>[4]</sup>。

## （二）调查研究是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

根据新中国的建交原则，“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sup>[5]</sup>1949年10月，苏联最先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随后，新中国陆续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等10个人民民主国家建交。按照《共同纲领》“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新中国也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芬兰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sup>[6]</sup>同时，根据“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的外交“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

地位”。<sup>[7]</sup>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培养并派出了一批新型驻外大使队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驻外使馆亦相继建立。然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外交方面虽有一些初步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sup>[8]</sup>。尽管同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未在实质上对建交国家形成全方位的了解。同时，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敌视态度，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周恩来认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sup>[9]</sup>因此，全面、及时掌握驻在国基本情况、外交动态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成为科学制定外交决策，保证外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1955年11月，张闻天在外交部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提高业务水平，关键在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研工作，是为解决当前的外交工作任务服务的”。<sup>[10]</sup>而驻外使馆作为我国驻建交国家的前沿“观察站”，在搜集信息，开展调查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由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也就成为新中国获取国际信息的重要途径。

## （三）在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是新中国借鉴他国建设经验的重要渠道

外交服务于内政，且与国内发展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百废待兴，“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sup>[11]</sup>，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任务。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

[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2] 《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3]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7页。

[4] 《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6]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356—35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8]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页。

[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页。

[10]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466页。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作。”<sup>[1]</sup>而在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可以为国内建设提供丰富信息,是我国学习与借鉴他国建设经验的重要渠道。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向首批驻外大使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资本主义的政治不能学,但是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sup>[2]</sup>1951年7月,陈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这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在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国外协助”<sup>[3]</sup>。1952年春,第一次驻外使节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在与大使们的谈话中提到,“不发展经济,不能增强国力,也不能加强国防,应付更大的战争,更谈不上提高人民的生活了。你们当大使的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研究驻在国的经济情况,提出报告,供国内参考”<sup>[4]</sup>。由此可见,驻外使馆在外交工作中注重调查和学习驻在国的先进经验,也是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

## 二、新中国驻外使馆调查研究内容的丰富发展

新中国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内容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

派驻初期,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多以礼宾工作及事务性工作为主。王稼祥自1949年10月到达苏联后即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使馆人员讲授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课程,并总结经验及时向外交部汇报。1950年4月,为系统了解各国交际、典礼、优遇等情况,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馆发出

通知,要求各使馆就驻在国有关交际、典礼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我国外交人员的接待和优遇办法等报回国内。<sup>[5]</sup>随后,各驻外使馆纷纷照此展开调研。如驻匈牙利使馆报告中经常注意反映驻在国交际礼节方面的处理方式及我工作人员的相关体会,考察内容涉及悬旗挂像情况、使节到任与离任的迎送、元首出席宴会情况以及驻在国礼节变迁等。对于该使馆所提中国出国代表团赠送礼品的意见,外交部曾表示提得很好。<sup>[6]</sup>驻瑞士使馆也在驻外一年后的总结报告中提到了围绕外交礼节等方面开展调研的重要性。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外交礼节的常识及不熟悉当地习惯,遇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这种情况下,“多调查研究,和谨慎小心的方针可以使在外交礼节上少犯错误”<sup>[7]</sup>。驻外使馆把调研重心放在外交礼节等方面,在派驻初期是十分必要的,为驻外使馆开展礼宾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制定驻华使馆相关条例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着驻外使馆工作的不断推进,调查研究内容也逐步扩展到驻在国内部状况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上来。1951年4月18日,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出任我国驻苏联大使。5月4日,他在驻苏联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着重指出:“今后使馆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研究驻在国情况和国际关系是驻外使馆的一项根本任务,只有完成好这项任务,才能处理好两国关系和双边事务,并发挥党和国家耳目的作用”,宣布“使馆增设研究室,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和苏联情况”。<sup>[8]</sup>同年7月至9月,张闻天接受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委托,作为外交部分党委驻欧特

[5] 参见《外交部关于了解驻在国交际、典礼、优遇等情况的通知》(1950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059-01。

[6] 参见《驻匈牙利使馆交际工作情况》(1950年8月-1953年12月),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372-05。

[7] 《我驻瑞士公使馆一九五一年对外活动总结》(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3。

[8]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页。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01页。

[3]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4]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页。



派代表到我国驻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6个国家的使馆逐一视察。张闻天发现，各使馆干部对驻在国情况了解不够<sup>[1]</sup>，因此在报告中提出，“必须把使馆今后工作的重心，转向于研究与报道驻在国的情况及其国际关系（国际问题包括在内）”，建议各使馆成立研究室（组），由大使、参赞直接领导、参加与帮助，吸收其他干部参与相关工作，并强调研究报道工作“是整个大使馆的工作，不只是一个研究室的工作”。<sup>[2]</sup>这一报告得到了外交部的重视。1951年12月，外交部分党委就转发此报告给苏联及东欧各使馆并各支部一事向毛泽东请示。请示电报明确写道：“目前各使馆的工作中心，是逐渐转向研究与报道驻在国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研究驻在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种建设的经验和外交工作的经验。”<sup>[3]</sup>毛泽东在阅后批示：“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sup>[4]</sup>由此，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思路得以进一步明确，调研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大，驻外使馆调查研究工作有了更为清晰的目标遵循。报告精神传达给各使馆后，其他各驻外使馆也逐渐将调查研究重心转移到驻在国国情及国际形势上来，设立研究机构，配备专门干部，研究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如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对驻在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视，指示“研究室在每次信使来前都要写报告，系统、详细地向部里汇报驻在国的情况”<sup>[5]</sup>。驻匈牙利使馆“为了更好地学习与了解驻在国和广泛开展友好工作”，不仅主动邀请驻在国负责干部到使馆做专题报告，亦派使馆人员拜会驻在国某些单位负责人员，以此了解驻在国有关外

交、对外文化活动等情况。<sup>[6]</sup>

1956年3月，张闻天在为外交部起草的《关于驻外使馆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各使馆“应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工作的具体条件和干部的力量，主动地酌情决定”调查研究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并列出了应当注意的几个重点方面，包括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及驻在国的动向和变化；驻在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基本情况；驻在国同我国的关系和改进双方关系的可能性等。<sup>[7]</sup>这既是对之前调查研究内容的归纳总结，也为此后调查研究的更好开展明确了方向。

### 三、新中国驻外使馆调查研究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各驻外使馆陆续确立了大使领导、研究室专司、其他部门配合的调查研究组织结构，通过阅读书报材料、与驻在国有关人士的谈话及实地参观等途径展开调查研究。

#### （一）书报材料调研

书报材料是新中国各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大使和领事可以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sup>[8]</sup>。阅读书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文字翻译问题，这也是各使馆开展外交活动的基础性工作。周恩来曾针对该问题指出：“做外交工作的一定要学习外语，已经会外语的要提高，不会的要从头学。”<sup>[9]</sup>从各使馆的相关调研情形观之，谭希林驻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将“了解、学习和研究驻在国的情况作为使馆工作的首要任务”，并“组织翻译力量，成立资料组，从

[1] 参见《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01页。

[2] 《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01、103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72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71页。

[5] 陈铁等：《回忆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6] 《驻匈牙利使馆一九五四年交际工作年终总结》（1955年1月），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371-04。

[7] 《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31页。

[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9]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1卷，第55页。

组织上给调研工作以保证”。<sup>[1]</sup>这一时期，除了出国前遴选的专业翻译人员外，有些使馆也开始注意对“中国派在各国的留学生”<sup>[2]</sup>加以利用。有需要时，还会雇佣部分外国人，如耿飚驻瑞典期间，按照当时北欧的习惯，正式外交公文及信函须使用法文，而该馆当时无法文翻译，遂聘请了“一位懂法文的瑞典人当法律顾问，兼做外交公函的法文翻译工作”<sup>[3]</sup>。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各使馆对驻在国新闻报纸和发行图书都予以了关注。比如，张闻天驻苏时期，苏联塔斯社每日将世界各大通讯社电讯稿的油印俄译本送至驻苏使馆，研究室工作人员“择其要者译出”，供使馆人员阅读与捕捉有效信息。<sup>[4]</sup>又如，张闻天为研究苏联的教育制度，通览了苏联中学的历史、地理、逻辑、生物、文学史等十余门课本，并且时常亲自去书店买书，“所购多数是新书，也有旧书，不论新书旧书他都要浏览一遍”<sup>[5]</sup>。

通过搜集和研究书报材料，驻外使馆较好地掌握了驻在国情况和时事动态。比如，驻匈牙利使馆自1951年3月建立研究工作部以后，迅速翻译了一部关于匈牙利各方面情况的基本资料供使馆同志研究和送外交部参考。此外，还建立了每日读报制度，及时了解匈牙利的最新情况，并根据读报记录每月研究整理出一份《匈牙利一月要闻简报》，自6月起按期寄回国内外交部。<sup>[6]</sup>又如，驻瑞士使馆将调研重心“集中于各报对我使馆及对中国的反映”，及时将各报重要言论译文报回国内。<sup>[7]</sup>

## （二）会谈与问询调研

[1] 史实：《记我国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第152-153页。

[2] 《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04页。

[3] 《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6页。

[4]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5] 《刘英自述》，第212页。

[6] 参见《我驻匈牙利使馆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2-03。

[7] 《我驻瑞士冯铨公使有关呈递国书的报告》（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4。

会谈与问询调研主要是驻外使馆同驻在国当局代表人物、其他使馆的人员及驻在国民间人士之间的交流，其中既有官方之间的往来，也有私人之间的联系，是新中国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的另一重要途径。

驻外使馆同驻在国上层领导人或各部门负责人之间的会谈往往依据中共中央或外交部指示，为解决重要外交事件而展开。比如，1953年，时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得知瑞典副外长哈马舍尔德即将当选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后立即将此消息报回国内。周恩来“迅速回电”，指示其与哈马舍尔德面谈，希望“争取他就任后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努力”。<sup>[8]</sup>此次会谈中，耿飚先后向其介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改革和建设成就，表示了我国的外交立场与态度。虽因美国从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仍未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此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使哈马舍尔德加深了对新中国和有关问题的认识，也使得中方掌握了更多国际信息和内容。又如，1954年3月6日，张闻天在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会谈中，通报了“中国对日内瓦会议的初步意见及准备工作”，莫洛托夫表示“各项意见很好，当提交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研究”，并表示“欢迎中、朝、越三国代表团4月中到莫斯科就日内瓦会议的筹备进行磋商”。<sup>[9]</sup>张闻天随即将此消息报回国内，为中国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外交决策提供了参考。

问询调研的一个重要对象是他国使馆人员。1950年10月，耿飚兼任驻丹麦公使。在其出使不久，丹麦内阁改组，前任外长与现任外长均向中国使馆写信致意，而对于如何处理这一情况，驻丹麦使馆尚无经验。为此，耿飚先后向驻丹麦的波兰公使、罗马尼亚代办和苏联公使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并“参照了这几个使馆的经验，才确定了妥当的处理

[8] 《耿飚回忆录》，第364页。

[9]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下卷，659页。

办法”。<sup>[1]</sup>驻瑞士使馆则“一般是向兄弟使馆（主要是苏联使馆）询问。对于有关瑞士的礼节，有时直接问礼宾处”<sup>[2]</sup>。1951年八一招待会及国庆招待会之时，该馆人员曾分头访问礼宾处及苏联使馆了解当地习惯（关于请客范围、服装等）。<sup>[3]</sup>驻缅甸使馆在问询调研的过程中注意到，谈话需把握分寸，若向对方询问情况，单刀直入地询问和漫无边际地谈问题往往使对方很难回答。<sup>[4]</sup>

维护好同驻在国各界人士的私人关系，对于开展调查研究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如驻匈牙利大使黄镇不仅与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亦与该国各界人士友好交往，“进行了大量的参观、访问和交谈，出席各种群众活动，结识了许多匈牙利朋友”，既增进了中匈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也使驻匈使馆对匈牙利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该使馆所报回的“关于匈牙利情况的报告，由初期以翻译资料为主逐步转为按专题进行整理的报告”。<sup>[5]</sup>1954年，驻瑞士使馆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采取了“适当增加个人联系的方式”，认为这一方式在调研中“是有用的”，但“要确定目的和对象，要研究方式和策略，并要有一定的范围”。<sup>[6]</sup>

### （三）实地参观调研

实地参观是新中国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渠道，为了解驻在国及周边国家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参观调研前，驻外使馆多通过办公室等部门做好组织筹备工作，大多事

先“经过了研究、请示和准备”<sup>[7]</sup>，有的使馆“每年制定计划，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专题”<sup>[8]</sup>。参观调研中，多数使馆以驻在国工农业生产建设为中心，深入基层，特别注重对生产管理经验的学习。如黄镇在匈方的协助与安排下，带领驻匈牙利使馆工作人员“在首都布达佩斯或到各州、区、市、乡，参观访问工矿企业和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并且每到一个工农业生产单位，都要同其各级代表开座谈会，“从生产管理到群众生活，他都很有兴趣地听取他们介绍，虚心请教”。<sup>[9]</sup>谭希林率领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人员对摩拉维亚等地区进行实地参观，掌握第一手材料。此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使馆亦根据指示展开了一定的军事调研。如1950年10月4日，周恩来致电驻朝鲜大使倪志亮，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武官观察组不要去三八线以南，应分为两个小组：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及平壤安东线、平壤辑安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sup>[10]</sup>参观调研结束后，一些使馆还注意总结经验，建立外交档案，尽量“使一切交际活动均有记录”<sup>[11]</sup>。由此，驻外使馆调查研究工作不断完善，“调研资料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很大提高”<sup>[12]</sup>。

[1] 蔡华同：《将军外交家耿飏》，翁明等：《大使的风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2] 《我驻瑞士公使馆一九五一年对外活动总结》（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3。

[3] 参见《我驻瑞士公使馆一九五一年对外活动总结》（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3。

[4] 参见《我驻缅甸使馆一九五一年度对外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2月），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51-02。

[5] 《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传》（上），第333页。

[6] 《驻瑞士使馆一九五四年交际工作总结》（1955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371-13。

[7] 《驻保加利亚使馆一九五二年交际工作总结》（1953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81-04。

[8] 史实：《记我国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第153页。

[9] 郭瑾等：《发展人民友谊的好大使，坚持党性原则的好领导》，姚仲明等：《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页。

[1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1] 《驻瑞士使馆一九五三年交际工作总结及部批复》（1954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261-06。

[12] 史实：《记我国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第153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调研过程中,驻外使馆常常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搜集材料、研究分析。驻苏联使馆在答复外交部有关工作的问题时提到,报告中“有些问题有苏联方面的成文材料根据,有些问题是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承其口头答复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根据实际经验以及从侧面了解的材料写成的”<sup>[1]</sup>。这说明驻苏联使馆为形成报告进行了多种方式的调查研究。驻匈牙利使馆也认识到,要把对书报材料的调研与日常经验积累结合起来,“重视观察,事事研究,建立交际活动日记,一方面及时记载对外活动的事项,一方面将所见所闻详加登记积累资料,以使经常查阅参考和总结经验”<sup>[2]</sup>。这就增强了调查研究材料的丰富性与客观性,提升了调查研究结果的准确度,为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积极帮助。

#### 四、新中国驻外使馆开展调查研究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在交际工作、外交决策、新中国建设、国内外交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为新中国驻外使馆开展交际工作积累了经验

“小心谨慎,注意报纸消息,与兄弟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并不断地调查研究,了解与熟悉当地习惯。这几项对于交际工作者是很重要的。”<sup>[3]</sup>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驻外使馆在外交部指示下注意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交际习惯,推动了交际工作有效开展。1951年,外交部“根据各使馆寄回的有关交际活动方面之具体情况加以整合为《驻外使馆交际活动情况》总结一份”,同时,“结合各使馆具体情况加以研究

并考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巩固与发扬以往的成绩与优点,逐步克服尚存之困难与缺点”,推动了各使馆交际经验的交流共享,使交际工作水平得到不断提升。<sup>[4]</sup>部分使馆还根据交际工作经历整理出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如1953年驻苏联使馆“根据现有的参考书结合苏联的具体情况编写了《交际工作手册》”<sup>[5]</sup>,1955年驻瑞典使馆整理了《有关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资料》<sup>[6]</sup>等。这些调研成果为新中国驻外使馆交际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 (二) 为新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外交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对于国家最高对外决策机构尽可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掌握信息等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驻外使馆对国际形势的变动、驻在国动态尤其是重大事件发展过程的报告与建议等,都为国内制定外交决策提供了参考。比如,各使馆“寄回的有关交际礼节及外交优例报告对国内制定外交礼节对外交人员优例办法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sup>[7]</sup>。又如,驻朝大使倪志亮就朝鲜战争情况展开调研,“夜以继日地搜集、分析战况”,“不断向国内报告”,并指导使馆人员撰写了《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为国内掌握战争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sup>[8]</sup>还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张闻天注意到苏联宣传中开始出现反对个人崇拜迹象,“多次要使馆研究室和新华社记者注意跟踪研究”,并先后向国内发回《苏联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反

[4] 《外交部通报我驻外使馆关于对外活动的工作总结》(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2。

[5] 《驻苏联使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交际工作报告》(1954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260-04。

[6] 参见《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编写的〈有关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资料〉》(1955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859-01。

[7] 《外交部请驻印度、印尼、缅甸等使馆答复有关外交礼节问题及寄回各项材料》(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55-01。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3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307页。

[1] 《驻苏联使馆答复有关交际工作问题的材料》(1952年12月-1953年1月),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374-01。

[2] 《驻匈牙利使馆一九五二年交际工作总结》(1953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81-05。

[3] 《我驻瑞士公使馆一九五一年对外活动总结》(1951年),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号117-00141-03。

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等调研报告。<sup>[1]</sup>毛泽东对此表示:这些“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每〈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sup>[2]</sup>。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各使馆对外交形势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对驻在国及国际局势的了解与认知,为国内进行外交决策提供了及时有效的依据。

### (三) 为新中国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借鉴

驻外使馆对驻在国建设先进经验的调查研究结果为国内各项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政治建设层面,张闻天先后于1952年6月下旬和1954年12月受命对“苏共中央政治局、组织部、书记处三个部门的机构组成问题”及“苏联外交部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经验”等进行调查研究,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党和政府的有关机构设置工作提供了参考。<sup>[3]</sup>在经济建设层面,耿飏通过参观调研将瑞典钢铁工业发展情况、芬兰人工造林事业及丹麦风力发电技术等“写成材料,报回国内,供有关部门参考”<sup>[4]</sup>。在国防建设层面,张闻天观察到当时苏联留学生众多,遂督促驻苏联使馆同志“对苏联当时的各类军事院校的分布、规模、专业设置、教学管理和培训能力等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以便国内能根据情况派遣学员”<sup>[5]</sup>,等等。这些调研成果及驻外使馆的相关建议报回国内后为新中国开展各方面建设提供了有效借鉴。

[1]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下卷,第656、660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页。

[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修订本)下卷,第646、670页。

[4] 蔡华同:《将军外交家耿飏》,翁明等:《大使的风采》,第30-31页。

[5]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四) 有力推动了新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驻外使馆通过调研、考察,为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交流合作提供了契机与保障。以驻波兰大使彭明治为例,他在驻波兰期间通过广泛考察,开辟了新中国成立后多个中外合作项目。如1951年1月,中国与波兰签订中波贸易、航运、邮电等协定,其中航运协定涉及的中波轮船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至今运营良好<sup>[6]</sup>;4月,中国与波兰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成为新中国首个文化合作协定<sup>[7]</sup>;10月,在波兰举办了大型中国艺术展览会,参观群众达5万余人<sup>[8]</sup>。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驻外使馆以切实的调查研究实践推动了中国与驻在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新中国外交工作中的调查研究特别是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使馆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有用信息,研判最新情况,内容涉及礼宾工作、驻在国基本情况、国际形势等方面,对新中国外交经验的积累、外交决策的制定、先进经验的引进及中外合作的推动等皆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燕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茅文婷)

[6] 参见《习近平在波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人民日报》2016年6月18日。

[7] 参见《中波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人民日报》1951年4月4日。

[8] 参见史实:《彭明治出使波兰纪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第44页。